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 团体：1920—1928

颜浩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的舆论环境与 文人团体：1920—1928

颜浩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颜浩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ISBN 978-7-301-14125-0

I. 北… II. 颜… III. 文化史-研究-北京市-1920—1928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6835 号

书 名: 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

著作责任者: 颜 浩 著

责任编辑: 艾 英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125-0/G · 242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7 印张 296 千字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总序

陈平原

美国学者 Richard Lehan 在其所著《文学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中,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在他看来,城市建设和文学文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第 289 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上海”或“西安”,同样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

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的关系。虽有文明史建构或文学史叙述的野心,但更希望像波特莱尔观察巴黎、狄更斯描写伦敦那样,理解北京、上海、西安等都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如此兼及“历史”与

“文学”，当然是我辈学人的学科背景决定的。

谈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必须兼及建筑、历史、世相、风物、作家、作品等，在政治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多重视野中展开论述。若汉唐长安、汉魏洛阳、六朝金陵、北宋开封、南宋临安、明清的苏州与扬州、晚清的广州与上海、近现代的天津与香港及台北，以及八百年古都北京，还有抗战中的重庆与昆明等，都值得研究者认真关注。如此“关注”，自然不会局限于传统的“风物记载”与“掌故之学”，对城市形态、历史、精神的把握，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坚实的学术训练；因此，希望综合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温情以及旅行者好奇的目光，关注、体贴、描述、发掘自己感兴趣的“这一个”城市。

关于都市的论述，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有多种角度与方法。就像所有的回忆，永远是不完整的，既可能无限接近目标，也可能渐行渐远——正是在这遗忘（误解）与记忆（再创造）的巨大张力中，人类精神得以不断向前延伸。总有忘不掉的，也总有记不起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使得我们不断谈论这座城市、这段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记忆不仅仅是工具，也不仅仅是过程，它本身也可以成为舞台，甚至构成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

既然我们对于城市的“记忆”，可能凭借文字、图像、声音，乃至各种实物形态，今人之谈论“都市想象”，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言的建筑、遥远的记忆、严谨的实录、夸饰的漫画、怪诞的传说、歧义的诠释……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珍惜，并努力去寻幽探微深入辨析。相对于诗人的感伤、客子的怀旧或者斗士的抗争，学院派对于曾流光溢彩的“都市生活”的描述与阐释，细针密缝，冷静而客观，或许不太热闹，也不太好看，但却是我们进入历史乃至畅想未来的重要通道，必须给予足够的理解与欣赏。

本丛书充分尊重研究者的眼光、趣味与学术个性，可以是正宗的“城市研究”，也可以是“文学中的城市”；可以兼及古今，也可以比较中外；可以专注某一城市，也可以城城联姻或城乡对峙；可以阐释建筑与景观，也可以讨论舆论环境或文学生产；可以侧重史学，也可以偏于艺术或文化。一句话，只要是对于“都市”的精彩解读，不讲家法，无论流派，我们全都“虚位以待”。

2008年7月22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目 录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总序/陈平原 1

导 言 舆论环境的构建与文人团体的形成/1

第一节 以杂志为中心的文人团体/2

第二节 作为舆论阵地的文化期刊/7

第三节 作为研究对象的 1920 年代/12

第一章 在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18

第一节 邓春兰投书与北大开女禁/19

第二节 “小题大做”的李超之死/33

第三节 林德扬自杀与青年之路/45

第二章 文人团体的重组与转型/57

第一节 北大的两个教授集团/58

第二节 周作人及其苦雨斋弟子/78

第三节 《莽原》与《狂飙》/98

第三章 舆论环境的重建与分野/115

第一节 从《太平洋》到《现代评论》/116

第二节 时事短评与西滢闲话/131

第三节 《语丝》杂志与北新书局/145

第四章 在校园内外/165

第一节 教育独立与大学之道/166

第二节 “驱杨”与“反章”/187

第三节 “爱国”与“求学”/207

第五章 革命:对话与想象/220

第一节 “五卅”:沉重的一课/221

第二节 逃出北京:大革命的另一解读/234

第三节 南北:文学与主义/246

参考书目/257

后 记/264

导言

舆论环境的构建与文人团体的形成

以杂志为中心的文人团体

作为舆论阵地的文化期刊

作为研究对象的 1920 年代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报章杂志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意义并不局限于文学领域。和晚清以降各种层出不穷的政治抗议运动相伴随的,是非官方舆论力量的日渐强大。在广播、电视迅速崛起之前,承担舆论制造及传输重任的,也只有平面的媒体。出版周期相对较长的书籍和强调时效性的报纸分享了一部分市场,另一部分则留给了期刊。无所不包的容量、灵活机动的风格、声名显赫的撰稿人和数量固定的接受群体,使得各类文化期刊很自然地成为了最有价值的舆论工具。

报章杂志的繁荣不但催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而且以期刊为中心,形成了志同道合的创作团体。近现代知识分子对期刊编辑与出版的强势介入,

使得这些创作团体带上了鲜明的文人化与学术化的色彩。同人杂志的大量出版,同时也满足了这些文人团体建构自我舆论空间、表达独立思想意识的需要。创办属于自己的刊物,也就成为了现代知识分子干预社会的最佳途径之一。这不但是他们表述自我的方式,同时也是他们生存的状态。

第一节 以杂志为中心的文人团体

从五四时代开始,刊物的独立性就成为了有志于报刊事业的知识分子共同的思考前提。对于这些处在转型时代的自由知识者而言,如果能做到“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①,显然是很具有诱惑力的。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随着出版物数量的不断攀升和影响力的迅速扩大,一个现代期刊追求并保持其独立意识的必要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首先,与商业报刊和社团刊物不同,知识分子型的期刊大多采用同人杂志的形式。这就意味着,从筹建、创刊、撰稿,到确定编辑策略和用稿方针等诸多方面,基本上是由一个相对固定的团体来完成。按照通行的规则,刊物的编辑对于同人的稿件没有选择的权利,一般要求来稿必登。因此,这个团体大部分人的兴趣和意志,也就决定了刊物的性质和归属。当然,所谓的“同人杂志”,也有不同的解释角度。一部分刊物对于自身观点的纯粹性较为看重,力图将其经营成独领风骚的“自己的园地”。《新青年》依仗着傲视群雄的作者资源,自第4卷第1号起,便已实现“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②。1920年代在北京出版的《语丝》,坚守着“主张上相反的议论则只好请在别处发表”^③的基本原则,明显表现出浓厚的同人色彩。另一些刊物在为自家人保留足够的空间后,并不拒绝团体之外的声音加入,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编辑者还力图以这种方式,淡化过于强烈的同人

① 胡适:《〈独立评论〉引言》,《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

② 《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

③ 《发刊辞》,《语丝》第1期,1924年11月17日。

氛围。例如,同样诞生于1920年代中期的《现代评论》,就在发刊词中郑重声明“本刊同人本不认本刊纯为本刊同人的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①。胡适在1930年代创办《独立评论》时,也表示“不希望它做我们这十一二个人的刊物,也不希望它成为我们的朋友的刊物;我们自始就希望它成为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②。

当然,从这些刊物的实际运作情况看,所谓的“公众论坛”,大多只是编辑的设想和宣传手段,并不足以改变其同人杂志的性质。因为无论是否承认,这些杂志的创作群体是相对固定的,外稿不但在篇幅和数量上都非常有限,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以“读者来信”的方式登载,成为编辑者阐述自我的另一个有效的途径。《新青年》在这一方面是最佳的例证,其“通信”栏目表面上是敌我交战的阵地,其实是同道之间声气相求的舞台。《新青年》同人借助“通信”,将专题文章中不便说、不敢说的议论尽情挥洒。无论是胡适和陈独秀关于白话文学的讨论,还是王敬轩的“双簧信”刻意经营“众声喧哗”的局面,“通信”在推进文学革命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已经成为论者的共识。在此之后的同人杂志中,尽管没有哪个“通信”能再现昔日的辉煌,但大多继承了《新青年》的编辑技巧和思路,将其发展成最灵活自由、也最具锋芒的名牌栏目。

1920年代的北京,同人杂志逐渐取代社团会刊成为出版界的主流。除了在编辑原则上充分展示团体意志外,另一方面就是政治性背景的逐渐淡化。简单地说,政权意志影响刊物的编辑和出版,无外乎两种手段。其一,以国家权力控制舆论导向,加强新闻检查的力度,限制接受群体的数量和范围。在某些情况下,也会直接用查封等手段剥夺刊物生存的权力。除此之外,另一个相对平和和隐蔽的方式是,充分利用金钱优势,掌握刊物的经济命脉,将其转变成为自己服务的喉舌和工具。前者可以说是在国家新闻政策控制下的报章杂志共同的命运,与是否同人杂志无关。因此,谋求刊物独立的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方式,也就集中在如何摆脱经济的外向依赖上了。

① 《本刊启事》,《现代评论》第1卷第1期,1924年12月13日。

② 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

从《语丝》和《现代评论》因为“二千元事件”旷日持久的论争中^①，不难看出这种经济独立意识被强调和重视的程度。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有影响力的刊物，应该拥有比较良好的销售业绩和社会关注度。也就是说，成功的报刊进入正常运作状态后，大多具备了自负盈亏的能力。因此，大部分外来的捐款或资助，都是以启动资金的方式呈现在编辑者的面前的，《现代评论》那神秘的“二千元”就是如此。所以，如何在筹备阶段拒绝外部的诱惑，也就成为了各个刊物不能回避的第一要务。内部捐款或集资是大部分同人杂志解决这个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办法。《努力周报》创刊之时，胡适和几个朋友议定以各人薪水的百分之五作为会费。《语丝》也是由鲁迅、周作人和川岛等人自掏腰包，垫付了第一期出版所需的费用。

不过，并非所有的编辑者都视这种情况为理所当然。胡适就曾说过，“无钱而办杂志办报，全靠朋友友谊的投稿，那是变态的现象，是不能持久的”^②。作为一种商品，报纸期刊应该是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之间的桥梁。但是对于同人杂志而言，市场处于半开放的状态中。一方面产品（刊物）必须投放到市场中，通过购买渠道实现商品价值；但另一方面，在成功摆脱了政治因素的干扰后，需要警惕的还有并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对刊物的左右。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大部分同人杂志对商业性广告的排斥。如果以现在的眼光看，《现代评论》刊载银行广告是无可厚非的，甚至会被看成生财有道而让人羡慕。但《语丝》等论敌之所以多次予以冷嘲热讽，主要是因为当时的银行资本几乎无法避免政府资金和官僚产业的渗透与控制。《语丝》对这类问题的敏感，内在的动因依旧是对刊物独立性的固守和维护。

有鉴于此，出版机构的民间化也就成了保证同人杂志经济独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几乎所有的现代同人杂志，都有北京或上海的书局作为固定的出版和发行机构。除非经营不善或宾主失和，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良性结合。书局的专业性和较为充裕的资金，为刊物解除了后顾之忧。按照

^①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② 1924年9月8日胡适致高一涵，《胡适全集》第23卷，第43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当时的惯例,书局一般不能干涉刊物的具体编辑事宜,编辑部仍然拥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权,刊物的同人特色并不会因此受到损害。一个反面的例证是,《语丝》被迫迁沪之后,正是因为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违规,插手稿件的选择和广告模式的确定,才导致主编鲁迅愤然拂袖而去。另一方面,除了能够大量地在自家负责的刊物上登载广告外,书局也可以借助编辑者的名气和刊物的发行量,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夺取同业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例如,原本籍籍无名的亚东图书馆,就是因为五四时期印行了著名的《甲寅》和《新潮》,才能够“名字叫人认识了”^①。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出版《新青年》的群益书社、与创造社有合作关系的泰东图书局等。北新书局和《语丝》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这个出版界的小字辈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本书的第三章第三节,对此有较为详尽的探讨。

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实体,大部分书局都另外经营畅销书,并不依靠这些杂志创收,甚至在必要时还必须自掏腰包,为杂志贴补或垫付亏空。在这种情况下,各大书局依然乐此不疲,就在于觉察到这些刊物潜在的商业利益。商务印书馆对《努力周报》的大力支持,用胡适的话说,“并非谋‘红利’,乃是‘商务’里面有几位朋友赞成我们的奋斗牺牲的态度,故为友谊的帮助。以几百万资本的公司,而担此三个铜子的小生意,至一年半之久,这是他们谋‘挣红利’的表示吗”?在得知胡适准备将《努力周报》改为《努力月刊》后,竞争者闻风而动,亚东甚至表示“愿意借贷来承办此报”^②,迫切的心情可想而知。

随着同人杂志的日渐成熟,以固定刊物为中心的自由知识者群体的面貌也逐渐清晰。兴盛一时的《新青年》在陈独秀南下之后,逐渐陷入窘境,勉强维持至第9卷便宣告结束。但从1921年南北两地的同人为了是否将杂志迁回北京而进行的争论中可以发现,他们唯恐“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

①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

② 1924年9月8日胡适致高一涵,《胡适全集》第23卷,第43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结”^①的意念是何等执著,其间起作用的,依然是昔日群体内部的凝聚力。1920年代的北京舆论界,《语丝》和《现代评论》占据了重要位置,同人团体是它们最醒目的标签。而从《语丝》到《骆驼草》,从《现代评论》到《新月》,知识分子群体的结合和重组,也是以相应的杂志为中心。正如周策纵先生在分析五四运动前后各类期刊蜂拥而至的状况时所指出的:“这些杂志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把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介绍给人民大众,并为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交流的渠道,他们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成为中国著名的社会、政治、文学方面的领导人物。”因此,这些知识分子同人杂志“无论在中国舆论的发展方面,还是在中国新知识分子的形成方面都是划时代的”。^②

胡适曾经期待过中国有“舆论家”(Journalist or Publicist)的出现:拥有与文化相关的职业,能够在经济上取得独立;并不直接从事具体的政治活动,但是保留“改良政治”的济世理想;同时通过有组织的结合,在舆论界形成一股可以影响当局、左右决策的不容忽视的力量。至于实现这个设想的具体途径,正如胡适在分析《独立评论》的办刊宗旨时提到的那样,无外乎两种方式:其一,“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其二,“发起一个刊物,来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③其实,胡适还忽略了一个相关的问题:不但舆论界需要有所谓的“小团体”的加盟,对于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而言,也需要有这样的团体来交流思想,需要有这样的刊物来发表思想。这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是他们的精神需求。“不说别人的话,不用别人的钱”^④的同人杂志,就是实现由文人团体直接制约舆论环境的最合适的途径。《新青年》在五四时期的成功,证明了这个理想的可行性。1924年创刊的《语丝》和《现代评论》,则更能体现知识分子团

①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7—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②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72页,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③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第65、14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④ 岂明:《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第54期,1925年11月23日。

体的自动结合,和对于同人杂志的自觉追求。

第二节 作为舆论阵地的文化期刊

正如上一节所分析的那样,期刊的大量出版和以此为中心形成的知识者群体,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尤其是五四之后,在现实的刺激和实用的要求下,报刊的数量增长得非常迅速,“这一年(一九一九)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①。总体上看,独立和自由是这些刊物产生和存在的基石,所以与这些文化现象相伴随的,是非官方舆论力量的不断壮大。既不是为国家机器服务,也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甚至不屑于为讨好读者而改变自己。大部分知识分子同人杂志希望做的,无非是“以负责任的人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任的话,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之所以强调和推崇“超然的、独立的政论”,也是因为对主流舆论的不满和不屑所致:“一个国家里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②更进一步地说,在这一选择中,还包含着对自我能力的充分信心和引领潮流的强烈愿望。

早在《新青年》时代,胡适就表示过对美国《新共和报》(*The New Republic*)的推崇和效仿。他所看重的,正是“一班政论家和思想家要想用一种‘思想界的组织’来做改造舆论的事业”,不但使“思想革新的运动能收到实地的功效”,而且使这个周报“成为世界上一种最有势力的杂志”^③。胡适曾表示,办一个像《新共和报》的杂志是他“十年来的梦想”^④。而由同人团体

①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第33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② 胡适:《我们要我们的自由》,《胡适全集》第21卷,第38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③ 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每周评论》第28期,1919年6月29日。

④ 1924年9月8日胡适致高一涵,《胡适全集》第23卷,第43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编辑出版的刊物,显然是实现这个梦想最有效的途径之一。陈平原先生曾指出,某些曾“独领风骚”的报刊,是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性文献来阅读的:“晚清以降,几乎所有重要的著述,都首先在报刊上发表,而后方才结集出版;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都直接介入了报刊的编辑与出版;几乎所有的文学潮流与思想运动,都借报刊聚集队伍并展现风采。”^①对于五四而言,《新青年》自然可算是这样的经典性文献;而在1920年代,《语丝》和《现代评论》应当是最合适的代表。

按照通行的规矩,为同人杂志撰稿纯属义务,是没有稿酬的,也不可能指望以此养家糊口。这些并非职业的撰稿者得以聚集在一起,不能忽略大学在这里所起的黏合作用。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大学往往是一个保留了相当程度自主性的特殊文化机构。大学校园从来都是各种思想和知识的汇聚之地,任何观点和看法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同好和支持者;另一方面,教书育人也是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们谋生的主要手段。尽管欠薪事件屡次发生,但大学教授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不属于生活拮据的阶层。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不甘寂寞的教授们从象牙塔中探出头来,自然难以克制对外面的世界进行评点和指导的冲动。尤其是北京大学,“结集了好些蕴蓄珍珠的活贝,由于命运之神的摆布,终于在短短三十年历史之内对中国文化与思想提供了重大的贡献”^②。《新青年》之所以有底气宣称“不外购稿”,正是因其背靠着国立北京大学。主编陈独秀被礼聘为北大文科学长,使一校一刊完美结合,大大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而《语丝》和《现代评论》深厚的北大背景,也是它们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两个刊物出版后的“极一时之盛”,当时在北大德文系就读的冯至有一段很生动的回忆:

每逢星期日早晨起来,便听见报童们在街上奔跑叫卖,花两三个铜板买来一份周刊,就能很有心得的度过一个上午。因为这些小型周刊的撰稿人主要是北大的教师和个别学生。他们通过这些刊物跟读者见

① 陈平原:《学人与舆论家》,《读书》1997年第3期。

② 蒋梦麟:《西潮·新潮》,第119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

一面,无拘无束地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感想,生动活泼,读起来很亲切。^①

仔细看看这两个刊物的撰稿人名单,不难发觉其与北京大学的天然联系。或者说,作为当时文人学者最重要的“集散地”,北京大学营造了独特的校园环境和舆论氛围。此外,经济上的相对优裕,也使得教授们能承担起没有经济利益的同人杂志的编辑和出版。也只有经济上的相对自立,刊物的独立才能成为现实。对于游离于政治集团之外的自由知识者而言,大学如同在十字街头建筑的塔,它所能提供的,是进可指点江山、退可优游林下的令人向往的生存方式。这种特殊地位,也是知识分子结社和出版的必要条件。本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便以此为重点,讨论了大学与杂志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不过,从清高严谨的讲学到慷慨激烈的议政,这个过程不是任何人都能轻松跨越的。1922年正在为《努力周报》的创刊四处奔波的胡适,就接到了不要做“梁任公之续”的劝告:“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②对于类似忠告,胡适并非没有犹豫,但他认为自己之所以“爱说闲话,爱管闲事”,并不是热衷于名利,而是“有时候总有点看不过,忍不住。王仲任所谓‘心愤涌,笔手扰’,最足以写此心境。自恨‘养气不到家’,但实在也没有法子制止自己”。^③因此,他最终以“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④回答了类似的质疑。可以推想,在许多“切迫不能已于言”的学者们身上,一定也曾有过与胡适相似的彷徨和抉择。

① 冯至:《但开风气不为师——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编《精神的魅力》,第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 胡适1922年2月7日日记,《胡适全集》第29卷,第51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③ 1929年9月4日胡适致周作人,《胡适全集》第24卷,第2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④ 胡适1922年2月7日日记,《胡适全集》第29卷,第51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至于发表言论的途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学术演讲,一是筹办刊物。”^①其中,学术演讲受制于时间、地点和接受人数等诸多因素,在影响大众的数量和范围上,不如各类期刊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这也就是胡适多次谈到并热心提倡“笔墨报国”^②的内在原因。也可以说,对于这些独立于政治集团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而言,报章杂志就是表达自我、启发民众、获取社会认同的最重要的渠道。对于一份完全由自己人掌握的刊物的向往,也因此显得分外迫切。这其实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校园与舆论相结合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社会舆论借助大学校园的学术与思想资源,大学教授通过传媒的力量宣传自己的主张。使二者相得益彰的最合适的中介,就是有着鲜明校园背景的同人杂志。

在回忆《语丝》创刊的经过时,荆有麟谈到了因孙伏园被迫辞职而失去言论阵地的无奈:

常写文章的人,忽然没有合适的发表地方,也有些不舒服。因为当时的北京,杂志是意外的少,《努力评论》,是胡适之先生发表政论的机关杂志,刚出版的《现代评论》,又是有政府靠山的宣传机关。至于报章,虽然已经都有了副刊,但《顺天时报副刊》,是为日本人而说话,邵飘萍的《京报副刊》,是专捧女戏子,《黄报副刊》,就是专登“阿呀呀,我要死了”的发源地。闹得当时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作品的人,简直没有插足的地方了。^③

当时,川岛也曾就创立一个新刊物的事宜征求过胡适的意见:“大概此后的《副刊》,难免要改面目,可是感到苦闷而思发泄的人,以后也许不再愿鱼目混珠,但总不能因为《副刊》换了面目,一般人便从此缄默。所以我们想,最

① 陈平原:《知识者介入社会的特殊途径》,《书城》1996年第3期。

② 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

③ 荆有麟:《〈语丝〉的发刊》,《鲁迅回忆录》,第19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这里有一个记忆的小错误,《现代评论》应该是在《语丝》之后创刊的,而不是之前。